

我刊自2013年2月號起，將增設「學術論文」欄目。因此，懇望海內外作者在投學術性稿件時，增添「內容摘要」和「關鍵詞」。

——編者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 何為自由主義的「國家建設觀」？

陳子明的〈憲政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觀」〉（《二十一世紀》2012年8月號）一文從憲政民主主義的視角提出了自由主義的國家建設觀，以與國家主義的國家建設觀相抗衡。作者深入討論改革以來中國的行政改革、官僚制建設與憲政轉型問題，其學理積累與經驗儲備使得其討論具有相當程度的合語境性。

不過，就其具體思路與論證而言，有幾點值得商榷：(1) 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理論對手並不僅僅是國家主義，還包括文化保守主義，後兩者的匯流是大國崛起背景下的重要思想趨向，三者構成「三足鼎立」格局，但作者沒有明確意識到這一思想結構變化及其意義，因而其分析的對話效果和邏輯力量就較為有限；(2) 單純的列寧主義視角已顯過時，需要關注古典治理智慧和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積極成果，從而設計出更為理性穩健、與中國歷史文明更具連續性的國家建設方案；(3) 作者在國家架構的縱向思考上對村民自治存在偏見，也缺乏明確的社會自治意識和風險社會背景下的公私

合作觀念；(4) 國家建設是一個複合的認同建構過程，與代表制結構密切相關，作者基本上以形式代表制為單一預設，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國家建設中的象徵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問題缺乏有效的理論解釋，因而無法說明後者的整合功能與相關機制；(5) 作為憲政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觀，高揚民主沒有問題，但缺失法治維度則顯屬偏頗，中國憲政轉型的頂層設計也需要法治維度的思考與建構。

田飛龍 北京  
2012.8.23

## 官僚社會的病灶及其救贖

蕭瀚的〈論官僚社會的憲政轉型〉（《二十一世紀》2012年8月號）一文值得稱道之處在於作者提出「官僚社會」這一充滿解釋力的學術概念，用以解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病灶。時至今日，國家權力的觸角仍能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與「官僚社會」相對的「公民社會」十分羸弱，社會組織發展緩慢，公民自治能力低下，「大政府、小社會」共同構成了中國「官僚社會」下的

基本生態。社會財富和權力迅速集中在少數資本階層和特權階層手中，腐敗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控制，強勢利益集團攫取了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作為既得利益集團阻礙着改革的推進。這些都恰恰印證了蕭瀚所揭示的「官僚社會」的病態特徵：「流動性等級制」、「資源的流動性壟斷」、「財富積累的搶劫性與分贓性」、「私權的無保障性」等。

該如何終結「官僚社會」？一個基本共識是建立憲政，讓「紙上的憲法」活起來，讓權力真正得到法律約束，讓官僚在法理型的科層制下運作。又該如何建立憲政？蕭瀚則給出了在當下很多學者中都很流行的「釜底抽薪」之策——所謂實行「土地私有制」、「聯邦制」、「三權分立」。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還有待在「思想的自由市場」接受檢驗和爭辯。因為這些「普世」方案看似很具吸引力，但結合中國國情分析未必經得起推敲。儘管如此，這些方案中所包含的分權、放權、法治理念是值得我們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時吸取的。

王聰 重慶  
2012.8.23

## 並非多餘的置疑

1990年代末，筆者偶然讀到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頓覺震撼。但漸漸地，如姚新勇〈直面與迴避——評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二十一世紀》2012年8月號）此文一般的疑慮也在心中浮現。正如姚新勇在文中論及：「愈來愈顯得高深的汪暉言說，卻慢慢向迴避權力暴行的方向退化，其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主義』的批判，不僅鋒芒漸失，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成為袒護『權力—資本聯盟』暴力的託辭，這點在《西藏問題》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但是汪暉真的是簡單地出於對體制和資本的袒護而喪失了批判的鋒芒嗎？或許我們真正更應該追問的是汪暉為何會有這種迴避呢？考察「汪暉們」的內心脈絡，不可迴避的是他們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從積貧積弱中救亡圖存歷程的銘記，是對中國革命百年來第一次為民族重新找回主體精神與主體意志的振奮，當然與之相對應，還有如姚文中所述「對一個具有高度同一性西方的警惕與想像」。

過去的歷史不完美，正像「汪暉們」為了它的合法性而苦心構建的理論體系也還遠不完美一樣，它或許還有諸多難言之隱，但這畢竟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以「道德的標準」作外在的批評，作為過程可以「很豐滿」，但現實卻往往很「骨感」，特別是這種批評除了給批評者與圍觀者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對於創造者內在的衝突與掙扎並不能給予更多的幫助。

當然，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種批評與置疑卻遠非多餘，至少它可以使創造者自我警醒，而且隨着中國主體精神與國家的逐步強大，這種來自真誠的自由主義人士的監督與置疑會變得愈來愈彌足珍貴。

鄭剛 深圳  
2012.8.25

## 也談中共成功的真正秘訣

高毅〈法國式革命暴力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2012年8月號）一文，是一篇反思中國革命的佳作。作者認為自譚嗣同以來，所有中國革命者都希望來一場法國式的暴力革命，認為這是克服中國民族危機的不二法門。共產黨尤其成功地運用了法國式革命暴力的恐怖性、群眾性和高效性。

作者的看法在一般意義上是對的。但是離開俄國列寧十月政變的經驗，中國共產黨是難以成功運用法國式革命暴力經驗的。法國式革命暴力在歐美並不具有普適性，但卻被列寧在俄國「成功」複製，尤其賦予其特別的恐怖性、群眾性和高效性。推翻俄國臨時政府、用機關槍解散立憲會議，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列寧式的革命暴力不僅吃掉自己的孩子，而且吃掉自己的父母。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並且在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前一直接受它的領導和經費，共產黨也始終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他們在中國成功的真正秘訣，應當是中國的皇權專制傳統結合列

寧斯大林尤其特別的恐怖性、群眾性和高效性的俄國式革命暴力在中國的徹底運用。

王炯華 武漢  
2012.8.25

## 政治運行的「兩張皮」

王正緒在〈中國國家元首制度的憲政化〉（《二十一世紀》2012年8月號）一文中認為，作為中國大陸國家元首制度的國家主席制度「名不副實」，不足以應付當下中國政治可能面臨的「制度陷阱」，因而，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應當對當下國家元首制度進行憲政化。

王文觸及當下中國一個非常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現象——即當代中國政治運行的「兩張皮」現象。新中國成立以後，一方面，現實政治實踐秉承着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運作方式，這是通過中華民族這一群體無數代人的身體傳承；另一方面，法律層面的政治制度卻幾乎都「取經」於西方（特別是馬列一脈），這得到了當下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即「馬列主義」）的支持。假如我們讓源自西方社會經驗的政治制度／思想來範導中國現實政治，那我們就是在做一種關於「當代中國政治應當怎樣運行」的規範性研究，而假如我們想讓當代中國的現實政治實踐合理化（甚或學理化），那我們就得頂住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的「『參照』轉『判准』」式壓力。

姚選民 長沙  
2012.8.27